

〔俄〕Б. Н.米罗诺夫 /著

张广翔 许金秋 钟建平 /译 钟建平 /校

# 帝俄时代生活史 上册

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013059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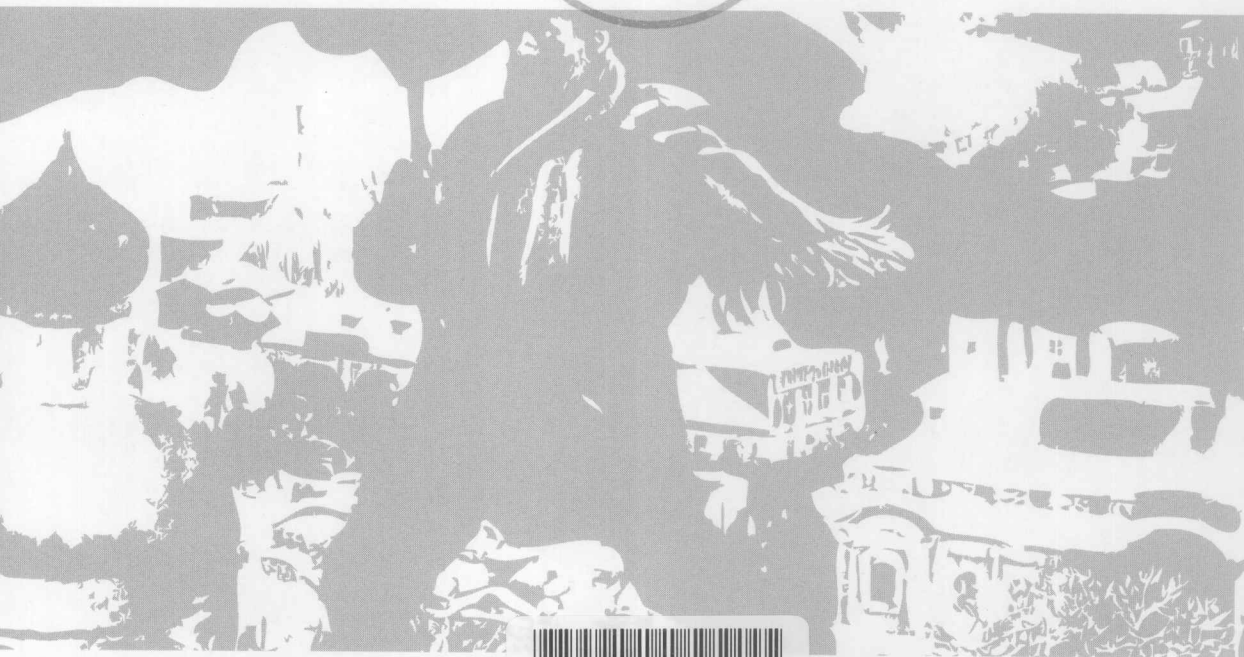
K512.4  
03  
V1

# 帝俄时代生活史 上册

## 历史人类学研究 (1700-1917年)



[俄] Б. Н. 米罗诺夫 / 著  
张广翔 许金秋 钟建平 / 译  
钟建平 / 校



北航

C1666002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K512.4  
03  
V1

013329827

Б. Н. Миронов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и революции в имперской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 Б. Н. Миронов, 2010

本书根据 2010 年版及作者提供的修订版译出

The copyright of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proprietor.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作者授予。

## 中文版序

现在要奉献给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曾在俄罗斯引起巨大反响。围绕本书提出的观点,学术界进行过两次集体讨论,发表的书评超过15篇。辩论者的意见迥异,或者完全认同,或者彻底否定。《祖国》杂志以“鲍里斯·米罗诺夫热”为题刊登了与辩论相关的内容。

这部专著何以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

首先,书中的新史料显著提升了争议水平。人体测量学资料——身高和体重数据——首次成为研究俄国居民福利状况的历史文献基础。现代科学认为,人的最终身高是生活水平的替代性合成指数(专门文献称之为生物状况)。人类生物学证明,平均身高反映了衣、食、住和医疗服务等需求的满足程度,基本需求得到较好满足的人比基本需求满足较差者身材高,反之亦然。据此可以推断,在单一民族框架下,同个子矮的人相比,大多数高个子成年人或者儿童饮食状况良好,受到的照顾更精心,居住条件更佳,生病较少等,即生物状况较高。利用平均身高数据可以评估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并据此判断居民总体福利状况的变化。

以1700—1917年的人体测量数据为基础,笔者得出结论,1700年至1915年期间,俄国男性平均身高约增长4厘米(从165厘米增长到169厘米),女性身高的增幅大致相同。不过,同17世纪末18世纪初相比,平均身高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帝俄时期的最后70年(1846—1915年),而18—19世纪上半叶则呈周期性波动。体重的变化情况与此相似。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推动了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从而影响到男性和女性身高的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存在类似情形。20世纪7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以后，国家日益富裕，具体表现在民众的饮食得到改善，人口的身高和体重增加。

其次，导致辩论白热化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苏联时期的主导观点认为，俄国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极端不平等，持续不断的危机最终导致革命爆发。而笔者的研究结论与其完全对立，这也是本书的要点所在。

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发生真正的经济奇迹。经济走向市场化：商人、农业生产者自主作出经济决策，完全按照市场机制确定价格。1861年至1913年间，国民收入增长2.84倍，人均收入增长0.63倍，人类发展指数从0.171提高到0.308，人均生产规模增幅达欧洲平均水平的85%。从19世纪80年代起，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超过欧洲平均水平，而且超过西方平均水平。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3%，甚至比1929—1941年的苏联高0.1%，仅比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美国低0.2%。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工业成就斐然，尽管存在制度性障碍，农业仍保持欧洲的平均增长速度。但最大的奇迹是，在经济和人口高速增长条件下，居民富裕程度提高，换言之，工业化伴随的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

改革后经济和社会生活取得显著进步，尤其是政治过程发生重大变化。政权最关键职能（社会化、吸收精英、沟通、协调利益、制定和实施政治方针、通过司法决定）的履行由政府部门、传统等级管理机构过渡到大众传媒、志愿性协会、议会、政党和各类学校等。俄国公民社会发展迅速，其基本要素形成。

虽然到1917年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仍未能完成，但专制制度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不容争辩的。近现代历史上欧洲国家不乏在集权制度下成功实施经济改革的例子。例如，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在王权统治下成功实现变革，而民主时期却与灾难性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哈布斯堡王朝覆亡后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过程亦与之相似。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如果现代化发展顺利，为什么还会爆发革命？

即便是在较为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仍然会面临诸多潜在的风险和问题。现代化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部分社会群体会受到冲击和考验，而且不可能立即使所有人都享有均等的财富。社会不同领域的现代化远非同步实现，有时甚至会以牺牲某些领域的利益为代价，社会关系紧张和失调不可避免。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秉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价值观及优先发展方向会出现分歧。在多民族国家，现代化易使民族问题激化。这一切几乎注定将加剧社会紧张程度和冲突。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通常现代化越顺利，社会冲突性越高。例如，经济快速增

长与政治不稳定之间成正比。

俄国也不例外。俄国的现代化是在欧化,准确地说是在西方化旗帜下进行的。现代化对社会高级阶层的影响大于低级阶层,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对城市的影响大于农村,对首都的影响大于其他城市。由此导致城乡之间、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地区、职业和民族群体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社会因此分裂为少数接受西方化思想的精英和大多数坚持俄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两大阵营,这是现代化造成的重要负面后果。同样,从价值观体系、政治取向和社会理想角度看,精明的西方化少数派并非一个统一体。其结果是,社会冲突和分裂逐渐累积。此外,现代化过程附带的破坏性后果日渐显现,如社会和民族间紧张关系加剧,冲突、暴力和犯罪行为增多,等等。正是迅速和成功的现代化制造了新矛盾,滋生了新问题,引发了短暂的局部危机。如果形势不乐观,这些危机将进一步发展为更大的危机;反之,则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因此,改革后俄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社会变化产生了消极后果,人们思想观念迷失,国家处于混乱状态,社会紧张程度和冲突性加深,社会经历所谓的变革创伤;另一方面,社会变化具有积极意义,正是由于这些变化动摇业已确立的稳定秩序,中断发展的连续性,打破力量的均衡,质疑或者使原有技能习惯失去意义,人们才得以发现变化的消极方面。因此,认为社会紧张状况和冲突标志着俄国社会—政治制度危机、落后和不完善有失公允:前者不可避免,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有利于制度职能的正常发挥,即依靠政治力量的对立实现社会—政治制度的平衡。

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原因不是19世纪60年代大改革后俄国持续不断的全面危机,而是社会不能驾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同其他卷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国家一样,俄国必然会为赶超式发展或过早实施现代化付出不菲的代价。抗议活动激增是社会迷茫的产物,也是民众获得自由、社会监督弱化和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结果,更是需求增长超过经济和社会满足能力的后果。

可以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称为现代化的系统危机,不过这与在苏联历史文献中提及的全面危机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后者认为,普遍的、持续的危机使俄国社会变成无所作为、缺乏活力的系统,这个系统停滞不前,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的生活条件,不能为居民提供福利保障。至今该观点在相关文献中仍普遍存在。旧事物的衰落伴随着新生事物的成长,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志。俄国社会的危机是成长与发展危机,并不必然导致革命,仅仅为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只是在军事失利、战时困难以及反对派和君主制度争夺政权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才成

为现实。

当代俄罗斯正重返现代化之路，并且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迅速而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同时避免革命。基于1905年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的经验，针对如何防止发生革命的问题，可以提出某些论点。

存在准备夺取政权的现实反对派，具备政权从一种政治力量和平过渡到另一种政治力量的现实可能性，反对派应当有机会以非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

通过和平、合法途径实现权力由失败者向胜利者的转移，这一理念应深入民众的政治意识，并成为社会的政治传统。

由于竞争和斗争，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周期性更替，人才在各管理层面和不同生活领域循环。

社会具备合法且现实有效的“阀门”，民众可以利用游行示威、罢工、集会以及持反对立场的大众传媒等形式和平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情绪，政权应当缓和而不是压制社会冲突。

应该优先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因为来自白领阶层的革命，其危险远大于蓝领阶层。帝俄时期，尽管中产阶级数量不多，但恰恰是他们充当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锋，目前中产阶级在俄罗斯扮演着相同角色。如果这一群体感觉自己是生活的主宰者，那么即便生活不令其满意，他们也不会通过革命破坏现有秩序，而是把精力投入到改善生活上。

必须将财产和社会不平等维持在社会安全水平并且考虑每个国家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的特殊性。20世纪初，美国的不平等分化系数（10%最富裕人口与10%最贫困人口平均收入之比）为16—18，英国为70—80，但这些国家丝毫没有革命的迹象，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贫穷的责任在贫困者本人。而俄国在分化系数较低（5—7）的情况下却发生了革命，因为俄罗斯人对不平等非常敏感，现在仍然如此。

应当持续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哪怕幅度不大，而且尽量避免生活水平短期性大幅下跌。

需要运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避免将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和大量伤亡的战争及他人人为灾难。

应当缩小俄罗斯与西方邻国之间财富水平的差距。明显的收入差距会引发被剥夺感，滋生不满。俗话说，“外国的月亮圆”，通常人们总是觉得别人的成就更大，因此，不断向民众灌输以下思想具有现实意义：只有在劳动效率提升的条件下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如果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德国或美国水平的

70%—75%，俄罗斯人享受更多的节日，大多数人工作时间较少，肆意挥霍水、土地、空气、森林等自然资源，那么我们不可能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中国正在经历迅速而且极其成功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同样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希望拙著能吸引更多的中国同行关注现代化，能为认识现代化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诚挚感谢译者及决定在中国出版本书的出版社。继英文版发行之后，我将拥有更多的读者。

特别感谢张广翔教授。他是真正献身于历史科学的人，是中国著名的俄国史和俄国历史文献研究专家。多年来，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俄国历史学的发展，并积极参与中国史学界分享所有重大变化。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本书才得以译介到中国。关于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但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人思想丰富、目标坚定并付出辛勤劳动，那么他就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张广翔教授就是这样的典范。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



# 作者的话

12

НАГАЕЧКА.

№ 2.



Оптовая продажа отдельных номеров в день выхода в свет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1-я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ая, д. № 10 кв. 19.

**Въ этомъ № 12 страницъ.**

Издатель Х. М. Кноррингъ.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ъ А. Ф. Ивановъ.

媒体、科学和文学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形象,对国内外关于俄罗斯的认知至关重要,影响着人们对俄罗斯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现象、进程和事件的评价。如果英国发生记者谋杀案,人们一般只会联想到刑事犯罪,而在俄罗斯发生同样的事件,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会将之与政治阴谋联系起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英国的形象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而俄罗斯至今在外国人心目中完全是另外一幅形象。将俄罗斯界定为欧洲国家、东方国家,还是独特的欧亚国家,这直接取决于社会学者将俄罗斯界定为什么样的形象,并以多大的力度渲染这种形象。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该国的形象联系密切。俄罗斯的形象是亚洲专制国家还是欧洲国家,是落后国家还是现代化国家,是穷国还是富国,均蕴含着不同的含义。而且,其他民族对俄罗斯人的尊重程度,以及俄罗斯人的自我尊重程度均取决于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无论如何宣称社会科学和政治生活分离,事实上,社会学家对现实世界发展的影响极其显著(哪怕是间接的),因为他们的结论最终将成为直接参与政治进程的、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政党的思想,乃至成为整个民族的思想。目前公众意识中关于俄罗斯的互相矛盾的形象(俄罗斯——欧洲国家,俄罗斯——亚洲国家,俄罗斯——欧亚国家,等等)首先都是由社会学家提出,然后在大众媒体中得到宣传。正因为学者们缺乏共识,才导致当代俄罗斯社会意识的分裂。

1999年,9%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60%——独特的国家,23%——兼具亚洲和欧洲特点的国家,其他人不置可否。<sup>①</sup> 2007年,7%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属于亚洲国家,11%——属于西方国家,74%——有自己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欧亚国家”,8%的人不置可否。<sup>②</sup> 假设两次调查的代表程度相同,我们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独特国家的观点影响力增强:1999年这一观点的支持率为60%,2007年——74%。其原因之一是近十年来积极使用文明和欧亚范式研究俄罗斯问题的社会学者的影响。例如,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古米廖夫(Л. Н. Гумилев)的著作每年都会大量出版。

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一个社会关于国家形象的不同观点并存会降低社会一体化水平。众所周知,当前俄罗斯社会的一体化程度不高:一部分人认为

<sup>①</sup> Опрос, проведенный Фонд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http://www.fom.ru/reports/frames/of1990501.html>

<sup>②</sup> Опрос, проведенный Фондом «Левада-Центр»: <http://www.levada.ru/press/2007072302>. 同样参见: Рабочая группа ИС РА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 Полис. 2008. № 1, 2, 3.

自己是欧洲人,另一部分人——欧亚人,第三部分人——只是俄罗斯人,第四部分人——亚洲人;其次,现有俄罗斯的不同形象决定了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例如,认为俄罗斯是欧亚国家者主张国家走特殊的发展道路;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者主张国家将来同欧洲实现一体化。因此,俄罗斯的每一种形象,不仅导致人们对国家的认知差异,而且会使社会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国家的未来。此外,更重要的是,这将影响到欧洲的构建——是否与俄罗斯融为一体。我想强调一点,目前欧洲的建设进程仍在继续,欧洲是否能吸收俄罗斯,换句话说,欧洲舆论是否把俄罗斯看做是欧洲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社会学家,主要是俄罗斯社会学家。因为,如果俄罗斯本身的自我认知不认同自己是欧洲国家,那么,外界更不可能承认它是欧洲国家。而俄罗斯自我认同为欧洲国家,以及世界接受其为欧洲的一部分,对于俄罗斯至关重要。

历史学家在塑造俄罗斯形象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恰恰是我们若干世纪的历史提供了构建国家形象的基本素材。如果把俄罗斯新历史时期的起点界定在1991年,那么,我们已经近20年生活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然而,尽管经历了巨大的震荡,苏联史学中有关帝俄时期的大多数观点依然存在。苏联时期建构的俄罗斯帝国形象是什么样的?主要是负面的。

“俄国——本质上是专制的、镇压的独裁政权,以奴隶制为基础,民众的精神充满奴性,社会长期缺乏等级制度和自治城市,自由普遍缺失,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压制个性。”<sup>①</sup>

“专制政权与文化的矛盾不可调和,与大多数受教育者进行公开的战争,与国家本身发生冲突,并不遗余力地推动国家走向必然的灭亡。专制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教育,使民众力量的源泉枯竭。国家事务掌握在不受监督、平庸和有伤风化的官僚手中。专制政权通过其仆从的肆意妄为进一步限制了自己的潜力。国家走向破产,财政混乱不堪,农民持续贫困——这一切只是专制制度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后果。”<sup>②</sup>

上述第一段引文出自当代作家坎托尔(В. К. Кантор)的著作,第二段——民意党人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С. М. 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1851—1895年)。前一段描述的是彼得一世以前的俄国,后一段则反映了1860—1880年俄国

<sup>①</sup> Кантор В. «... Есть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держава»: Россия: Трудный путь к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сторико-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1997. С. 467—477.

<sup>②</sup> 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 М. Россия под властью царей. М., 1964. С. 351. 该书英文版1885年在伦敦首次问世,两年内三次再版,并同时在英国、瑞士和法国(1887年)发行。

的现实。两种观点提出的时间相隔 112 年，但他们的精神是如此之相似，似乎属于同一个人。类似的引文还可以列出数百个。或许，只有俄国历史学家才会这样极端消极地描写本国历史，而他们想象中的本国历史可能更为消极。公认的俄国权威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1890—1900 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了一些大概他不想在课堂上讲，也不想作品中写的话：“我们的国家机器更适于防守，而不是进攻……我们是世界生物群中的低等生物：甚至在失去头颅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运动”，“俄国沙皇——不是操控机器的机械师，而是菜园中吓唬禽类的稻草人”，“我们的未来将会比我们的过去更沉重，比现在更空虚”。<sup>①</sup>

一些当代学者把俄罗斯人归为低级社会生物——基因上缺乏发展和解决现代化问题的能力：“不仅 19—20 世纪，而且 21 世纪初，大多数俄罗斯人仍以传统（神话）意识为主导，过去需要，现在也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俄国没有作为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载体的群体，因为俄罗斯人的民族基因和文化基因尚未最终形成……俄国民众没有能够表达自己社会利益的精英，缺乏个人自我认同、迎接现实挑战的精神，这使得解决加速现代化的任务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建设公民社会都面临着问题……俄罗斯人天性上不愿接受权力精英。这种情结与斯拉夫人历史上形成并保留下来的追求权力而非自由的潜在欲望交织在一起。”<sup>②</sup>

即使在一些学者比较温和的评价中，帝俄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是效率极端低下，既不能够保障经济的发展，也无力提高民众的福利。主要从两个视角阐述整个帝俄时期，一是民众贫困化，二是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危机。贫困和危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危机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发生革命，因为农民日益贫困。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农民和工人处于贫困境地——这几乎是所有关于帝国时期著作的主要思想。盛行一种观点，即俄国的新都建立在数十万人的白骨之上，国家对外政策、文化和经济成就以广大民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俄国没有任何值得骄傲、值得学习的东西，集体的历史记忆背负着内疚和自卑心理。

西方则完全不同。例如，受本国历史著作的影响，美国公民为自己国家的历史倍感自豪。他们既不往自己的脸上抹黑，也不因为下列事实而痛苦：美国的领土是从印第安人手中夺来的，他们把印第安人赶到了保留地，近两个半世纪内白人的财富建立在剥削黑人奴隶的基础上。1861—1865 年国内战争时才取消奴隶制（顺

<sup>①</sup>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Письма. Дневники. Афоризмы и мысли об истории. М., 1968. С. 323, 335, 395.

<sup>②</sup> Кожурин Ю. Ф.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и стадийного подхода //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Саранск, 2007. С. 167, 169, 170, 171.

便说一下,这比俄国废除农奴制还晚若干年)。之后的100年间,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黑人一直受到屈辱的歧视。美国有七个州是在1846—1847年战争中从墨西哥手中夺来的(占其最初领土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同样为自己的帝国而自豪,尽管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残酷剥削,其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帝俄境内出现的最极端情形。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讳言其历史事实,教科书中也毫不隐瞒,但国民并不为此感到痛苦和羞愧。与此相对比,从18世纪起直到现在,许多俄国人为他们心中所想象的本国历史缺陷而痛苦,甚至羞于称自己为俄国人,尤其是有外国人在场之时。

回想一下,在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欧洲,俄国的负面形象出现在16世纪下半叶(当时经常与俄国发生冲突的波兰着力于此)。“莫斯科维亚人的历史表明<sup>①</sup>,以他们这种非欧洲的行为,不能称之为欧洲人。欧洲的 authors 通过描绘其邻居和敌对者(主要是土耳其人,从16世纪下半叶起还有莫斯科维亚人)非欧洲的、不良的品质,来揭示自己基督教世界的本质。这种文化机制已被证明非常有效,为欧洲所需要。对于16—17世纪,我们可以重复武尔夫(Л. Вульф)的观点(他针对启蒙时代所讲),假设现实中不存在俄国,西方也会把它臆造出来。”<sup>②</sup>而俄国,出于崇高的目的——建立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民主社会与独裁政权斗争的年代,政论作品和自由主义史学著作中确立了国家的负面形象。在苏联史学著作中,国家的这种形象增添了新的恐怖色彩,写进历史教科书,并因此进入大众意识。

我在拙著《俄国社会史》中反思了很多有关俄国的陈旧观点,但却无法重新研究最顽固的陈旧观点之一——帝俄时期民众日益贫困。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观点不仅仅指民众持续贫穷,而且将贫困化作为一个过程。当时我缺乏合适的工具评估居民福利的发展趋势。民众福祉是衡量国家改革与经济活动效率的试金石。如果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那么意味着国家和经济工作卓有成效,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或者反之。然而,长期以来缺乏可靠的资料评估两个世纪以来帝俄民众的生活水平。现在,我终于找到这一途径——人体测量数据(首先是身高或者体长)。从历史人体测量学角度看,人体测量指标能够充分反映民众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前工业社会时期。世界许多国家进行的数百项人体测量研究显示,当生活水平提高时,居民的平均身高增加;而当生活水平降低时,居民的平均身高下降。为运用这

① 15—17世纪外国旅行记者记叙中对俄罗斯人的称呼,当时他们称俄罗斯国家为“莫斯科维亚”。

② Филлюшкин А. И. Как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для Европы Азией // Ab Imperio. 2004. № 1. С. 225—226.

种方法，我不得不收集整个帝俄时期的居民身高（体长）数据。我在档案馆工作了8年，建立了大型个体数据资料库，其中包括305 949人（1695—1920年出生、不同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出生地区、教育程度、职业和民族）的各项人体测量数据（各时期的身高数据齐全，19—20世纪初偶尔还有体重、胸围和肺活量等数据）。30.6万份个体身高数据，意味着30.6万行Excel表格。仅将这些信息输入计算机就需约一万个小时，打印出来足有7 000余页。此外，我还拥有1 020万份1874—1913年所有新兵身高的汇总数据。人体测量数据是资料库的骨架，但这个资料库并不仅限于骨架：其中还收入了饮食、价格、工资、死亡率、农业生产、赋税、赋役、储蓄等福利指标的全部既有资料。通过分析所收集的资料，我塑造了全新的俄罗斯帝国形象——它是一个与我们的西方邻国同样成功发展的国家，证实了我在《俄国社会史》中提出的主要结论：俄国是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历史上的悲剧和矛盾不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多，成就也不逊于任何欧洲国家。

在我撰写本书的10年间，同行中既有人支持我，也有人反对我。一些人曾不屈不挠、千方百计地阻挠本书的出版。关于这些人，我会在其他时候指出。而在此，我只想感谢那些帮助和支持我、对我提出积极建议和善意批评的人：

数学家：布莱恩·阿赫尔（Брайен Ахерн）、波克罗夫斯基（Д. А. Покровский）和斯基托维奇（В. В. Скитович）；

外国同行：约尔格·拜通（Йорг Байтон）、彼得·林德尔特（Питер Линдерт）、阿兰·奥姆斯捷特（Алан Олмстед）、大卫·兰歇尔（Дэвид Рансел）、格列戈里·弗里斯（Грегори Фриз）和维拉尔德·桑德兰（Уиллард Сандерлэнд）；

圣彼得堡的同行：布尔加科娃（Л. А. Булгакова）、卡先科（С. Г. Кащенко）、库利科夫（С. В. Куликов）、列别杰夫（С. К. Лебедев）和萨福诺夫（М. М. Сафонов）；

“列昂季耶夫中心”的同行：瓦西里耶夫（С. А. Васильев）、卡列林娜（И. А. Карелина）和藻斯特罗夫采夫（А. Заостровцев）；

莫斯科的同行：萨哈罗夫（А. Н. Сахаров）、博卡列夫（Ю. П. Бокарев）、博罗德金（Л. И. Бородкин）、维什涅夫斯基（А. Г. Вишневский）、戈金（Е. З. Годин）、克罗夫（В. В. Керов）、科列林（А. П. Корелин）、梅杜舍夫斯基（А. Н. Медушевский）、波特金（И. В. Поткин）、吉洪诺夫（Ю. А. Тихонов），以及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19世纪俄国史中心”的学者们，本书稿在这个中心讨论通过并得以出版。

其他城市的同行：叶罗申科（М. Е. Ерошенко）、卡利亚金（Ю. Калякин）、索

斯诺芙采娃(И. В. Сосновцева)和索斯诺芙采娃(О. В. Сосновцева)。

特别感谢慕尼黑大学教授约翰·科姆洛斯(Джон Комлос)——当代杰出的人体测量学家,一个极为优秀的人。自1989年相识之日起,我就得到他的全面帮助和支持。近20年来,在提供计算机程序、论文和专著、新资料信息等方面,科姆洛斯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邀请我参加国际会议,对我提出友善的批评、建议和意见。正是通过他,我才得以全面掌握现代历史人体测量学的成果,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包括在本书中应用这些成果。

前 言

1906

Цена 10 коп.



# СИГНАЛЫ

С-Петербург, в. О. 13 л. 2.

ВЫПУСКЪ 4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世界历史学界第一部俄国历史人体测量学著作。本书的宗旨是研究帝俄时期居民福利水平的变化。居民福利本身不仅对社会生活而言极其关键,而且可以作为分析帝俄普遍发展状况、评估执政者政策效率的重要依据。

目前的文献对“生活水平”或者其同义词“福利”的概念缺乏一致性解释,因为生活水平的内涵十分宽泛,常与意义相近、但又有区别的“生活质量”、“居民状况”等概念共同使用。20世纪末以前,人们从不同角度对生活水平进行解释,其中物质要素是关注的重点。现在社会普遍认为这个概念应当包括更加广义的福利。因此,当代经济文献提出了由多项生活水平评价指标组成的模式。俄罗斯采用国家统计委员会制定的包括56项指标的评价体系和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所制定的包括46项指标的评价体系。联合国1989年制定了由50项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最简单的评价体系有14项指标。所有的评价体系普遍包括就业与劳动条件、生活卫生条件、人口特点、营养状况、收入与支出、生活成本与价格、教育与文化、社会保障、休息制度以及人的自由程度等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采用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评价生活水平的概括性指标。人类发展指数考虑3项指标:人口寿命、教育水平和国内总产值。居民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是确定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sup>①</sup>。

在对该问题的多年研究中,笔者整理了能够接触到的全部资料,得出了结论并不乐观:(1)尽管竭尽全力,但历史学家永远都无法获得现代科学提倡的关于生活水平抑或生活质量的最低评价指标,哪怕是帝俄最后几十年的评价指标;(2)人类发展指数只能近似地评估改革后1861—1913年间的情况,并且仅针对国家总体而言;(3)或者应当放弃在较长时间段内认识生活水平发展趋势的尝试,或者需要寻找具有史料保障的替代性指标。

令人欣慰的是,科学发现了评价生活水平的替代指标——人的最终平均身高(体长<sup>②</sup>),又称为“生物状况”。采用这个指标的依据是在人体生物学中得到证明的事实,即最终平均身高反映了一个人衣、食、住、医疗服务等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基本需求得到较好满足的人在身高上超过基本需求满足欠佳的人,反之亦然。从生物学角度讲,身体完全发育成熟以前,人将消耗的食物转化成能量,然后支出能量以满足不同的需要——维持机体的生命活动、工作、学习、运动、抵抗各种传染

① Ефимова М. Р., Бычкова С. Г.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М., 2004. С. 462—475.

② 现代俄罗斯人类学使用术语“体长”。但因为笔者在研究中收集和使用的资料基本属于以“身高”称谓这一人体测量特征的时代,所以以使用“身高”为主,仅新生儿例外,对他们采用以卧位测量的“体长”,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高”。